

浅析 13 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

王亚平

内容提要 “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是西欧中世纪王权的理论依据。13 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广泛的拓荒运动,促进了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演变,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王权的性质和权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改变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要求。经院哲学在阐述理性的同时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法学家们在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对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权论”,由此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世俗的政治理论“主权论”为刚刚起步的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理论,为其继续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关键词 西欧 13 世纪 自然法 “主权论”

“君权神授”是西欧中世纪采邑制的理论注释。13 世纪的西欧经历了近两个多世纪的拓荒运动,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西欧贸易的活跃、城市的复兴和发展。逐渐多样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致使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了改变,从事多种经济活动的人的个体性增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逐渐地鲜明,个人的权利和公共的权利间的界限也随之清晰,以个人联合为主体的采邑制的政治体制不再适应这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而政治体制的演变可以说起始于政教之争。政教之争打破了自法兰克王国时期起建立的政教联盟,动摇了“君权神授”理论的政治根基。西欧各国君权都有意识地在政治上与罗马教会分离,同时为寻找新的理论依据而支持并促进对罗马法的研究。中世纪的法学家们用经院哲学方法重新诠释自然法,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破除了习惯法不能变更的禁忌。自然法中新的法理元素符合正在形成的新型社会共同体组成的契约原则,这种新的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结成了契约关系。因此,在这个新的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个代表各成员共同利益的集权,13 世纪的法学家们由此提出了“主权”这一新的政治理论。

“主权”的政治理论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中研究的热点问题,因为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主权概念是法律的术语。政治学家们一般认为,“主权”(souverains,英语 sovereignty,德语 Souveränität)是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属性,是以 16 世纪法国的博丹阐述主权概念为起点的。^①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美国历史学家坎托洛维兹最先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中世纪西欧政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9 年度一般项目“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演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A770048。

① A. 文森特《国家的理论》(A.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 页。

治学理论的演变,他在其《国王的两个身份——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12世纪起西欧政治理论从基督教的社团学说(Christliche Korporationslehre)向国家学说(Staatstheorie)的演变过程。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强调“这一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主权国家及其永恒的权力要求的某些问题,它阐述了那个时代对一些政治信仰表述的理解及其对早期现代国家形成的促进作用。”^①自此之后,西方历史学界把对“主权”这个政治理论与中世纪晚期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以及现代国家产生的研究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中世纪晚期的国家理论以及早期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②一些政治学家们也开始关注主权概念的历史演变。詹斯宁就很明确地指出“主权学说是中世纪末期为了促进世俗国家摆脱教会控制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理论。”^③英国学者霍夫曼认为,主权与国家的概念不可分离,构成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体系,尽管也有一些西方的政治学家企图将这两者区分开,但不管他们如何“尽力地把国家主权从前门推出去,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又从后门溜了回来”。在霍夫曼看来,现代主权概念的特点是“主权明显地表现了权力在特定一国的集中”。然而霍夫曼又强调,既然主权涉及的是政治的最高权力,所以不应否认的是,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君权也都存在着主权性,只是这种主权性表现在君主权力的集权化上。君主权力的集权化是在社会共同体保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霍夫曼把中世纪的主权看作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总体上的权力”^④。然而,不论是西方的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依然把有关“主权”概念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史和法学史的领域内。但是,“主权”这个术语在13世纪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史实现象,这是政治结构演变的一种具体表现,而这种政治结构的演变是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同步发生的。

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演变

中世纪西欧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起始于土地用益制度的演变。中世纪西欧的土地是社会的唯一资源,因此土地并不是简单地被占有、被交换,而是有条件的使用和收益。在对土地用益的同时,土地被赋予了社会的政治关系,从土地中产生出了各种权利和义务。用益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土地用益制度的转变引发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演变。

西欧中世纪的土地用益制度源于日耳曼人实行的财产共同所有制,即所有财产由马尔克成员共同所有、共同享用。^⑤墨洛温王朝早期,国王以土地作为俸禄(benefice)无条件地分配给国王的扈从。获得土地的扈从没有完全地占有土地,而是享有了对所接受土地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8世纪初,宫相查理·马特为了增强王国的军事实力,把无条件地分配土地改革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的封授

① E. H. 坎托洛维兹《国王的两个身份——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E.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V页。

② 从1967年至1968年德国中世纪研究会先后召开了三次专门的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术讨论,并于1970年出版了汇集三次会议论文的两卷本的《14世纪德意志的领土国家》(*Der deutsche Territorialstaat im 14. Jahrhundert*, 齐格马林根:1970年版)。

③ 詹宁斯著,龚祥瑞等译《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0页。

④ 约翰·霍夫曼著,陆彬译《主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3、42、44页。

⑤ K. S. 巴德尔《乡村共同体和乡镇》(K. S. Bader, *Dorfgenossenschaft und Dorfgemeinde*),科隆、格拉茨:1962年版,第11页。

土地(feodum) ,土地的这种封授塑造了一个新的、以服兵役为基础的贵族群体——封臣(vassus) 。^①因此,封赐的土地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资源,而是附加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君主恩赐给为其服役臣民封地作为后者维持生计的俸禄(praedium) ,由此与封臣之间建立了一种俸禄关系(Pfründenwesen) 。封臣对作为俸禄的封地享有使用的权利,与封君建立起一种具有强烈依附性的附庸关系。^②封地制度并没有转让土地的所有权,君主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有支配土地的权利(dominium) 。然而,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依然是授封者的,但实际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则是受封者的。这就如同前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说的“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因陪臣的自由支配封地的要求而受到限制,而陪臣的权利又因他的主人的最高所有权受到限制。”^③正是这种互为限制构成了封建的统治关系。封君为了保证封臣对所接受封地的使用,必须给予封臣一定的保护,保护是通过给予封臣各种豁免权得以实现的,如免征各种租税权、开办市场权、征收关税权、铸币权,等等。因保有和使用土地附加的豁免权转化为各种权利,即采邑权利(Lehnrecht) 。^④正因为如此,波梁斯基强调“复杂的封建等级制的形成意味着同一块土地的所有权为许多人分有。等级上并列着的集团中的每一个人(例如:公爵、伯爵、子爵、男爵等等) 都要求土地所有权的一份。在这个基础上,新产生了所有权分为陪臣的从属所有权(使用权 dominium utile) 和他的领主的最高所有权(土地支配权 dominium directum) 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陪臣得到了领地的经营使用的自由,但必须负责使它完整。”^⑤英国著名的学者梅因也给出这样的结论“真正古代的制度很可能是共同所有权而不是个别的所有权。”^⑥在西欧中世纪,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采邑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只有享有土地所有权,才可能拥有权力,而占有土地这一事实本身就蕴涵着一定的权力”^⑦。

然而实行采邑制以后,层层分封的封地面积不断扩大,而王室的领地(villae) 的面积则因为封地(feodum) 面积的增加而缩小,或者说封地的面积被碎化了。另一方面,9 世纪以后西欧各地普遍开展的拓荒运动也增加了封地的面积。封地面积的扩大致使对土地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0 世纪以后的德意志地区出现了迈尔庄园(Meierhof) 。这种迈尔庄园实际上是一种租佃的管理模式,封建主或以实物、或以货币、或以徭役的形式收取庄园的收益,并有权随时收回租佃的土地。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多普施的研究,10—13 世纪在德意志地区有为数不少的迈尔,甚至依附农也可以通过获得迈尔权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以此得到了土地的用益权,改善了经济状况。^⑧与迈尔制同时出现的是雇佣制,多普施引用了大量的教会和修道院的文书证明,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农村中早就存在着雇

① vassus 源自于凯尔特语,被引进罗马语中后指奴隶,《撒利克法典》中这个词则特指对国王负有义务的封臣,即附庸,特指新的服兵役的贵族。参见米泰司《采邑权和国家管理:中世纪国家制度研究》(H. Mitteis, *Lehnrecht und Staatsgewalt. Untersuchungen zur mittelalterli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魏玛:1958 年版,第 16—25 页。

② 《中世纪百科全书》(*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第 5 卷,斯图加特·魏玛:1999 年版,第 1807 页。

③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230 页。

④ H. 克伦本茨主编《欧洲经济社会史手册》(H. Kellenbenz, hrg.,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第 2 卷,斯图加特:1980 年版,第 100—101 页。

⑤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第 229 页。

⑥ H. S. 梅因《古代法:其早期社会历史的条件以及与现代思想的关系》(H. S.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di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伦敦:1890 年第 13 版,第 147 页。

⑦ 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 页。

⑧ A. 多普施《德意志皇帝时代的领主和农民》(A. Doppsch, *Herrschaft und Bauer in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耶那:1939 年版,第 51—61 页。

佣劳动,有了相当一批的雇佣农民。这些雇佣农民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摘收葡萄、运送葡萄酒、收割谷物等等。农忙季节,有的修道院每天的雇工甚至多达5000人左右。^①

法国与德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封地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将其称之为“一个缓慢而不动声色的革命”^②。法国领地面积的缩小,首先是因为给教会和修道院大量的土地赠予,尤其是10世纪从克吕尼开始的修道院改革使各个修道院获得了大量赠予的土地。仅克吕尼修道院从910年建立到1048年间就获得了近千份的土地捐赠证书,共有2058阿克的土地面积。^③显而易见,修道院如此庞大的地产是不能靠修士自己经营的,修道院或委派修士或委托给其他人监督和管理庄园,由农奴耕种或是把土地出租给他人收取实物地租,这就为管理修道院地产的人提供了将其据为己有的条件。此外,夹在领地内的一些以“劳役周”形式耕种的狭长的条形地也逐渐地与相邻的份地同化,转变为份地,徭役地产由此越来越少。这些不再附带劳役的地产逐渐松动了农村中的人身依附关系。^④

从12世纪起,英国的领主就已经开始将自营地出租,庄园的管理者实际上就是耕地的“承包人”。12世纪末期,英国各地领地中相当一部分耕地都出租给了佃农,在各地都能看到租佃耕地的契约,强制性劳动让位于雇佣劳动,维兰以货币替代了服劳役,13世纪有超过半数的英国成年男子成为领取货币工资的日工或短工。^⑤正是因为以租佃方式经营土地,才导致大领地内大地产面积的缩小。^⑥

地产组织结构的改变是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演变的根本原因,租佃制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在封建社会中“自由”是在强权保护下给个人的一种权利,但自由农民只有服从封建主的庄园法,在其司法权的保护之下才享有自由承租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根本无法防御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又由于必须借用磨房、水车、牲畜等生产工具,个体的自由农民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封建主的庄园,必然要结成社团,即以庄园为核心的庄园共同体(Hofgenossenschaft)。庄园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且也是一个在封建主司法权管辖之下的法律联合体。封建主利用司法权尽可能地使庄园共同体成为一个封闭的社团,为租佃制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不仅土地的承租人必须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禁止其与外人结婚,否则他将失去承租权或称为“农民权”(Baumannrecht),封建主有权随时收回租佃给他的土地。实际上农民的自由又受到“农民权”和封建主的司法权的制约。

尽管这一时期土地买卖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但无论是农民还是小贵族、骑士、迈尔等,土地买卖只能在庄园这个共同体的内部进行,因为土地是“内部财产”(Inwärtseigen)。^⑦这种封闭的社团是地方分权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正如皮茨所说的,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和经营方式有了变化,但是中世纪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生产部分的基础,小封建主是贵族统治和行政

① A. 多普施《德意志皇帝时代的领主和农民》,第117—118页。

②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6页。

③ E. 撒库尔《克吕尼派:克吕尼派至11世纪中期在教会和通史中的影响》(E. Sackur, *Die Cluniacenser. In ihrer kirchlichen und allgemeingeschichtlichen Wirksamkeit bis zur Mitte des elften Jahrhunderts*)第2卷,达姆斯塔特:1965年重印版,第407页。

④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第148页。

⑤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⑥ M. M.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503页。

⑦ 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7—229页。

管理的基础”^①。但是,这种经营方式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中世纪的商业规模的扩大和经商方式的改变。

早期中世纪西欧的商业活动主要以远程贸易为主,且这种远程贸易有很大的局限性,都是在国王和教俗封建主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中世纪早期的市场和商业活动都牢牢地掌握在教俗封建主的手中。西欧大规模开展的拓荒运动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由此,粮食和经济作物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之中。尤其是从 13 世纪起,英国、佛兰德、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家或因扩大养羊业而改耕地为牧场,或由于以渔业为主而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普鲁士、波兰、西里西亚以及德意志中部地区的粮食通过威克瑟河、奥德河、易北河运送到沿海的汉堡、罗斯托克、维斯马、艾恩贝格等城市,再从这些城市输出。莱茵河畔的科隆是中世纪德意志中部地区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早在 11 世纪就和英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14 世纪以后又增加了粮食贸易的新内容。^②

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拓荒和殖民活动中进行重组;社会劳动的再分工改变了农民的法律身份和经济状况;因封建主改变了对土地的管理方式,农村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尽管还没有占主导地位;商业贸易活动的活跃冲破了庄园制经济的封闭性,商业不再仅仅局限在城市里,而是形成了新的交易场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生活在这个变动社会中的人们需要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西欧中世纪的农民是一个依附性较强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群体性首先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所决定的。简单的生产工具、轮作的耕种方式以及收获方式,都使得农民不得不结成农村社团(Gemeinschaft)。^③ 社团的成员要服从社团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不是由某些法律的制定者制定的,而是在这个社团众人共同默许的基础上一致同意的结果。^④ 其次,农民本身具有的法律身份也将他们结为一体,他们只有依附于一个社团才能得到司法上和军事上的保护,这种必需的保护增强了农民间相互的依附关系。最后,农民的群体又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他们社会性的行为受到共同信仰的宗教伦理的约束,这无疑也是农民被束缚在依附关系中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上述的经济演变逐渐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方式,农民的社团生活松动了,农民的个体性增强了。货币松动了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依附关系,经营土地的各种方式也使农民的社会交往不再仅限于农民社团的范围内。从自然的和人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扩大了他们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社会交往的范围,农民的个体性(persona)突出了。个体性的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有了很大的自由,同样也与市民一样渴求有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社会约束力,因此农村社会也对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费希特所说“法律的形式,即它的约束力,只有各个人都同意以这个确定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才得以保持。由此可见,所有的人仅仅在权利和法律方面是意见一致的;谁与大家的意见一致,谁就必定想要权利和法律。”^⑤可见,社会中享有自由的社会群体越大,自由的程度越大,就越

① E. 皮茨《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和社会史》(E. Pitz,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utschland im Mittelalter*), 维斯巴登:1979 年版,第 160 页。

② E. 皮茨《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和社会史》,第 142 页。

③ C. 梅克斯佩尔主编《晚期中世纪的心态和日常生活》(C. Meckseper, *hrg. Mentalität und Alltag im Spätmittelalter*), 哥廷根:1985 年版,第 46 页。

④ W. 乌尔曼《中世纪的社会和个人》(W. Ullman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巴尔的摩:1966 年版,第 59 页。

⑤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13 页。

需要有法律的制约。自我与他人的、个人与社会的这种新关系的出现为中世纪的法律赋予了新的内容,原有的习惯法以及针对具体事务的王室法令都不再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关系,需要对其进行新的思考。对法律的思考和其他一切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一起汇入了经院哲学关于理性的争论之中。

二、“老瓶装新酒”的自然法

社会经济的演变、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以及个体性的增强,伴随而出现的是人们的思维习惯的理性化。社会经济的演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的心态和精神方面发生变化,传统的权威观念被动摇,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来,表现为一种自我自主性。正如曼罗所说“12世纪文艺复兴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①另一方面,在这同一个历史时期,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会之间围绕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权进行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争斗。这种政治的实践无疑对“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德意志的皇帝从被发现的罗马法中找到了为自身辩护的理论依据,大力支持和促进对罗马法的研究。世俗君主因集权的政治需要给予罗马法研究的支持,与社会广大民众因自由程度的增大而对法律的要求“不谋而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法学应运而生,在西欧沉寂了几个世纪的自然法也因此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法学家关注的命题。

自然法不是实践的法律的概念,而是法律哲学的概念。斯特劳斯这样界定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万物‘原则’之追寻,而这首先指的是对万物‘起始’或‘最初事物的追求’。”^②法律哲学则是对那些已经如此的习惯法渊源的追求。自然法是其追求的重要方面,因为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所以哈特说“自然法学说是古老的自然概念的一部分,在其自然概念中,可以观察的世界不仅仅是这些规律的景象,有关自然的知识也不仅仅是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相反,根据这种古老的世界观,每一种可指名的存在之物——人、有机物、无机物,不仅被想象为倾向于维护自身的生存,而且被想象为不断谋求某种有利于它的最佳状态或适合于它的目的(the end)。”^③最早提出自然法观念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把人的社会与自然相对应,认为社会就像大自然一样,人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元素。在自然界中每个动物或生物都有着自然律规定的位置,因此人在社会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自然界中存在着的规则和法令。^④西塞罗在传承希腊哲学时对自然法的概念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正义为大自然所固有,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在拉丁语中,名词的大写表示特指的专有名词——笔者注),这个法是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在西塞罗看来,理性构成了法律的基础和本源,法律源于自然的理性,也就是神的理性。^⑤在拉丁教父奥古斯丁那里,西塞罗提出的神的理性被转换为上帝的意志。他认为正义是一个永恒的标准,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必须遵循一种更广博的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国家,而这个正义可以在人性

① D. C. 穆洛《新生活时期》(D. C. Munro, "A Period of New Life") 杨主编《12世纪的文艺复兴》(Ch. R. Young ed.,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纽约:1969年版,第7页。

②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页。

③ 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85页。

④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54页。

⑤ 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8—160页。

与上帝相联系的那部分结构中发现,因为现实的法律秩序是建立在上帝意志的基础之上,而上帝的意志是真理的终极源泉。如果国家的法律不符合正义,就不具有真正法律的特征,如果法律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便没有法律。所以他认为,正义的主要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上帝不仅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创建了规则,而且也为人类的灵魂性质创建了规则,这些规则是永恒的法律(*lex aeterna*)。^①因为法是上帝意志的产物,所以法是不能更改的,只能尽可能地进行解释。^②这是自法兰克王国以来“君权神授”神学政治理论的法律基础。从法兰克王国时期起,因采邑制而建立起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行会、修道院等为模式的群体社会生活的实践,习惯法以庄园法、行会法乃至教会法等法律形式的施行,都为奥古斯丁的自然法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换一个角度来说,社会经济环境对自由的制约,习惯法的不可更改性,似乎又都很“合理”地被纳入到奥古斯丁用基督教教义对自然法的解释之中,使得他的理论可以占据垄断地位几百年而未被撼动。

自然法虽然有着延绵不断的连续性,但是在这个“老瓶”中盛装的“酒”却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被更换。传统习俗的不可更改性的习惯法严重地滞后于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对中世纪的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12 世纪对罗马法研究的复兴无疑是对这种新要求的回应。对罗马法的研究催生了中世纪法学的产生,经院哲学倡导的理性对法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认为,这是因为“法律并不是某个人或许多人的意志,而是具有普遍性合理性,并不是‘意志’而是‘理性’”^③。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对自然法进行的详尽阐述,用理性主义的观点修改了直至他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实行的习惯法不可更改的原则。托马斯没有否定法是上帝预先设定的秩序,但却认为这个秩序蕴涵在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性之中,可以通过人的理性获得。所以法学家要注重发现这个秩序的路径和过程的理性,注重发现法律的正确思维方法,在不断的发现和思考过程中修订法律。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可以更改和制定的。^④托马斯认为,人的法律乃是整个神圣统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天上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这个体系来统治的。这一体系是不折不扣地出自上帝的理性,一切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上帝的理性加以调解的。^⑤托马斯强调自然法是上帝的理性,人法是对自然法的体现,他既肯定了古典希腊哲学关于自然法的传统理论,也没有否定基督教关于上帝和人的关系的神学教义理论;同时又通过阐述上帝、自然法和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调和了自然法与人法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托马斯从基督教神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的阐述,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西欧社会中存在的习惯法不可更改的不成文的“禁忌”。

13 世纪以前,解释法律的国王们并没有被看作是法律的给予者,尽管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已经在改变习惯法的内容,但国王的立法权限仍然受到习惯法观念的限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人们来说,法律古而有之,古老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立法只是在恢复古老的法律。13 世纪以后,经院哲学家们对自然法的诠释促使西欧的法律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革。按照乔利夫的话说,“这些变革是以

① 莫里森《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66 页。

② 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0 页。

③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台北联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9 页。

④ 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第 100—101 页。

⑤ 乔治·雷·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300 页。

一种作为立法变革这个真正本质的方式实现的。”^①这就为此后西欧现代立法制度的建立清除了理论阻碍,为新的世俗政治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三、主权王权的世俗政治理论

在采邑制基础上确立的封建王权的合法性需要“君权神授”神学政治理论的注解,采邑关系是以保护和义务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从而形成了西欧中世纪特有的个人联合的政体。12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社会中具有自由身份人的比例大大增加。然而,这些从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的个体的自由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了其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反而因此失去了采邑关系给予的保护。为了寻求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更需要结合为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不再是类似庄园或者城市那样的共同体,而是保护个人利益而结成的新的共同体。边沁说“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②在这个由自由个体因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共同体中,需要一个集权化的权力,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主权”(souverains)。

Souverains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3世纪。在这个世纪里,王权的集权与罗马教会的至上教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更为激化,而对罗马法的研究也促进了教会法与世俗法律的分离。因此,在政治理论方面,教会与君权的分离也不可避免。这个时期的法学家们愈来愈多地提到了“主权”这个新的政治概念。正如詹宁斯所说“主权学说是中世纪末期,为了促进世俗国家摆脱教会控制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理论。”^③13世纪西欧社会中新产生的共同体不再是以依附关系组成,大量自由人的出现对具有依附关系的采邑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市民在有围墙的城市中有了共同的生活,成立了行会这样的共同体;农民则是以租赁制的经营方式扩大成为一个共同体。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这些共同体都是以契约的形式结成的,不再存在着依附关系。恩格斯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④为保证契约的有效,就需要有一个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认可的、能够制约每个人的权威,即集权化的权威。因此在这种新的共同体内需要一种新的集权——主权。霍夫曼把中世纪的主权看作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总体上的权力”^⑤。

Souverains这个术语是13世纪法国的博马努瓦尔提出的。^⑥他把主权解释为是一种法律的概念,是封建贵族和君王对各自领地的统治权力,每个伯爵都是其伯爵领地内的主权,而国王则是所有

① J. E. A. 乔利夫《从英国的殖民开拓到1485年的中世纪英国宪政历史》(J. E. A. Jol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from the English Settlement to 1485*), 伦敦:1947年第2版,第334页。

②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8页。

③ 詹宁斯《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0页。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页。

⑤ 约翰·霍夫曼《主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⑥ 1283年法国的法学家菲利普·德·博马努瓦尔在其编纂的《博韦习惯法汇编》(*Coutumes de Beauvaisis*)中这样写道“每个伯爵都是其伯爵领地内的主权……国王是所有臣民的主权。”(chascuns barons est souverains en sa baronie,li rois est souverains par dessus tous)。参见考萨克《欧洲与罗马法》(P. Koschaker *Europa und das römische Recht*),慕尼黑·柏林:1966年第4版,第143页。

人的主权。^① 因为君主权力的集权化是在社会共同体保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主权意义上的王权不再是国王与封臣之间的个人的权利关系,而是与社会中不同利益者结成的共同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在 13 世纪以后的西欧历史中,市民、贵族以及王权之间的斗争相互交叉,同时也在斗争中相互结盟,并最终有了等级议会这样的政治产物。美国学者波齐认为“等级议会是为了与统治者对抗和合作的特殊目的而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被看作有一种特殊的政治魔力,拥有很少政治特权的单一构成的等级在那里联合起来并转而去争取更有意义的目标和更广泛的特权。”^②

13 世纪西欧的政治体制是随着经济结构的演变而发展的。庄园制度的逐步解体,土地租赁制度的愈来愈盛行,采邑的义务和封臣的效忠也因为越来越物质化而松弛,采邑权也不再是封建领主个人所掌有的权利。德国学者迪斯特坎普认为,在发生这个过程的同时,采邑制度领土化了(Territorialisierung des Lehnswesens),采邑权(Lehnrecht)转化为国家权(Landesrecht)。“在中世纪晚期,以领主个人为特征的采邑权消弱了,被统一在了领土化的制度中。”^③美国学者利维十分强调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与国家形成的关系,他认为中世纪土地所有权与直接政治控制权的分离是现代国家产生的一个条件。^④在以地域为特点的领土制的国家中,主权的概念被强化,所以在这个领土化了的地域中,领土化是形成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采邑制所具有的保护和义务的原则被淡化。在以保护和义务为原则的个人联合的采邑制的政体中,国王只是个体的个人,采邑权转化为国家权以及封建王国的领土化,使得国王的身份有了本质的转变,国王成为一个共同体中权力的象征。“国王乃是主权者,并非仅止于封建统治集团的首脑这样的概念”。^⑤

在领土制的王国中,王权依然是最高的权力,王权就是主权。但是承载王权的国王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国王应该公正地进行统治,应当参照极为古老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和尽量准确地执行王国的法律。国王要根据法律进行统治,所以他要受法律的约束,受上帝的和自然的种种法律的制约。法律被视为是无所不在的,它渗入并控制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臣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⑥政治观念的这种改变,使“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失去了政治上的实际意义,法律在政治上的作用被突出了。门戈尔认为“法律是把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组成一个民族并建立一个国家组织的最为强大的纽带之一。”^⑦在领土制的王国中,国王雇佣那些受过法学系统教育的人担任王室的官员,导致封臣尤其是主教的政治职能减弱,这是政治权力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权力世俗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认为,“从社会学来看,也就是说,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采邑制实行的服兵役制度消除了武装力量和居民之间的距离,所以“封建社会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

① J. H. 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1450 年》(J.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 350 - c. 1450*),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9—510 页。

② 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7 页。

③ B. 迪斯特坎普《采邑权和中世纪晚期的领土》(B. Diestelkamp, “Lehnrecht und spätmittelalterliche Territorien”),帕策主编:《14 世纪的德意志领土国家》(H. Patze, Hrg., *Der deutsche Territorialstaat im 14. Jahrhundert*),齐格马林根:1986 年第 2 版,第 72—79、83 页。

④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 页。

⑤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 124 页。

⑥ 乔治·雷·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 251 页。

⑦ C. 门戈尔《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C.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厄巴纳:1963 年版,第 227 页。

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①。12世纪,西欧各地相继出现了征收兵役免役税取代服兵役的现象,雇佣兵制取代了服兵役制。雇佣兵不是国王私人的武装,而是一种公共权力的武装力量。恩格斯说“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②

公共权力的增强源自于公共领域的确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有了公共的要求,按照卢梭的说法就是有了“公意”,而这种“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③。公共的利益使一个区域内形成了一种意志、一种意识,即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的人结合起来。法国学者狄骥将其称之为“公共的自我”意识,“它是公意,国民的意志;而且这种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是人民的普遍意志”。他认为正是这种“公共的自我”意识使民族成为一个人格的主体,而国家是一个有组织的民族。所以,“国家是主权者,因为它是有组织的民族,并因此而具有这种普遍的主权意志”^④。

对公共权力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公民缴纳的赋税上,纳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每个社会阶层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拿起了“权利”的武器,“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的政治护身符”^⑤。然而权利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有的、普遍实行的、不变的习惯法已经无法继续调节日益发生变化的社会矛盾,为了使习惯法适应社会就必然要有为社会制定法律的给与者(law-giver)。因此,这个时期的立法变革首先是创建了专门的立法机构,有了专职的立法人员。“人们在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把这种制定新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新型权力融入统治者一直行使的较为古老的权力——亦即它们组织和控制政府机器的权力——之中,直到把这两种权力融为一体,变成一种难分难解的最终被称之为‘立法’权的东西。”^⑥可见,立法活动并不是在制定规则,而是在改进规则。法律改进的这一过程是主权国家形成的过程,是宪政制度的创建过程。因此,这种创建不单纯地是一个法律表现,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的表现,西欧各个国家在改进规则的过程中先后踏上了通往宪政的道路。

[本文作者王亚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 300387]

(责任编辑:任灵兰)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6、8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7页。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④ 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第228页。

⑤ 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⑥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true meaning of polity” of Japan as “world’s best” polity. The world view of Nishida philosophy preached the world-ness of the royalty ,and advocated “a new world order ” to make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bathe in the splendor of royalty”. In modern times when Eurocentrism played the dominant role in the world , Nishida philosophy which emphasized openness and pluralism displayed strong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values. However ,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thnocentric tendencies that existed i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 national view and world view of Nishida philosophy.

Zhang Jingwei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Thinking on Periodiz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dating of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s at different times , so that the constructed systems of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have different features. Scholars of both countries have dated it according to system transition , not simply on social morphology. They have all modified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dating methods. B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rgue: Firstly , the beginning date of modern history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 historians certainly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 Secondly , there exist interaction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 national histor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history. They should have matching or approaching points; however , it is normal for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 because a nation is specific in its history and condition , and is affected by outside strengths with different pace and distances. Thirdly , the five social patterns are based on productive relations , meanwhile ,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basis of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a point of one-way development from agriculture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historical division and periodizati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productive forces is not incompatible. They should be cross-referenced and inclusive.

Wu Hao , Ma Zemin ,*The Scheme of Land Allotment and Fundamental Cause of Southern Homestead Act of 1866*

The Southern Homestead of 1866 aimed to resolve the land problem of freedmen and provided the relative favorable application terms with the black applicants. However , because the most freedmen were absent of the original capital and other credit recourses for applying homestea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id not offer any credit and loan support to them , they can not utilize the favorable terms to become independent farmers.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failure of Southern Homestead of 1866.

Wang Yaping *On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in 13th Century Western Europe*

In the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 the Crown power was justified by the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sis: Divine Rights of Prince , which means the rights of prince are ordained divinely. In the 13th

century , Western Europe witnessed a massive movement of reclamation which promoted the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rade , and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d gradually. So the feudal crown power , which was based on that old structure , also experienced some changes in its nature and attributions , and the appeal to alter the legal system , whose core was customary laws , was brought up. The scholasticism , when it elaborated the reason , also expounded new views on the tradition of natural law; and the jurists , when they studied Roman laws by scholastic method , infused new nomological elements into the idea of natural law. With these conditions , the jurists proposed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to substitute the theocratic idea Divine Rights of Prince. The secular theory of Sovereignty prepared grounds for the newly-starting parliament system and cleaned path for its ulterior development.

Meng Zhenhua *The Early Achaemenid Policy on Judahites Reconsidered*

Traditionally , the text of Cyrus Cylinder and relevant biblical texts were considered the mutual testimony of a historical event that Cyrus the Great encouraged the exiled Judahites return home and rebuild the temple. This article will re-analyze the Cylinder text to trace out that the text did not directly relate to the return of Judahites. While , re-reading Achaemenid edicts in the Bible , these edicts will be proved to be not real , either. The history of early Achaemenid Dynasty indicated that its policy on Judahites was mainly aimed a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ax collection rather than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the return and rebuilding the temple , and the limited tolerance to Yehud was served for the empire's own interest , which deeply affected the history of Yehud during the Achaemenid Period.

Jiang Bao *On the Involvement of Persia in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Peloponnesian War(431-404B. C.) was not only a civil war among Greek city-states led by Athens and Sparta respectively , but also a war between Athens and Persia. In 412 B. C. , Persia allied itself with Sparta and intervened in the war formally. The main reason of Persia's intervening in the war lies in wanting revenge against Athens and to reoccupy its lost lands on the west coast of Asia Minor during the Persian War. The "Cold War" between Persia and Athens after the Persian War , the Sparta's falling back on Persia and the great failure of Athenian army in Sicily prompted Persia and Sparta to get allied. During the war , through Satraps in Asia Minor , Persia provided Sparta with military subsidies , which helped Sparta to won the war finally. Persia's intervention also led to the Athenian oligarchic revolution in 411 B. C. , and set a precedent for Persia's later intervention in Greek affairs.